

苏联的农业

(1953—1964)

〔美〕拉扎尔·沃林著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F351.2

1

苏联的农业

(1953—1964)

[美] 拉扎尔·沃林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502659

Las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m Alexander II to Khrushchev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译出

苏联的农业

(1953—1964)

〔英〕拉扎尔·沃林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郭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30,000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69 定价: 0.76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摘译自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俄国农业一百年：从亚历山大二世到赫鲁晓夫》一书。该书原分三编：第一编叙述俄国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起直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农业情况；第二编讲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农业；第三编介绍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农业方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采取的一些措施。这里摘译的是第三编全文，加上前言、绪论和最后一章《总结和展望》，篇幅约为原书的一半。这一部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进行的所谓“改革”，所收集的数据也较为丰富，对研究赫鲁晓夫掌权期间苏修农业的演变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后，扯起建设“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破旗，在各条战线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农业方面乞灵于大规模开垦荒地，大举种植玉米，撤销机器拖拉机站，把各加盟共和国以下的各级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等办法，企图把粮食、肉类和经济作物等产量搞上去。赫鲁晓夫甚至扬言要在六十年代超过美国和在1980年前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他下台的前一年(1963年)，苏联农业发生

了大歉收,使得1963—1964年的冬天在苏联城市中几乎看不到白面包,猪的存栏数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苏联在社会主义年代原是粮食出口国,这一年不得不破天荒进口粮食一千多万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而且变本加厉地复辟资本主义和大搞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使苏联的农业生产进一步陷入困境。1975年“灾难性”的农业大歉收,粮食生产只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按人口平均计算,粮食产量甚至比沙皇时代的1913年还要低,完全戳穿了他吹嘘的所谓“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谎言。

苏修叛徒集团修正主义的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农业政策是竭泽而渔的政策,他们只想拿到粮食,而不注意农田基本建设,更不顾农民的死活,结果耕地遭到破坏,大量土地盐碱化、沼泽化,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他们一贯实行高征购政策,赫鲁晓夫时期粮食的征购率一般都占当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要高,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使许多地方不能及时播种,禾苗大量枯萎,水土流失,甚至成熟的谷物大量丢失在田里。所以苏联二十年来虽然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化肥使用量有所增加,但农业生产仍是一片混乱。这是苏修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本书作者拉扎尔·沃林的出身和经历,在本书“前言”中已有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他在书里论

述了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失败，但是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把失败的真正原因找出来，至于他把失败主要归咎于没有推行更加有力的物质刺激措施，这就更不足为怪了。此外，他还在多处贬低斯大林，攻击斯大林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对富农的清算，说斯大林战后的农业政策使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等等，在有些地方却美化了赫鲁晓夫，希望阅读时注意批判。

1976年3月

前 言

拉扎尔·沃林(1896—1966年)生于俄国明斯克州。他的童年是在柏林和波兰华沙附近度过的。后来他们一家搬到了哈尔滨，他在那里读完了俄国人办的中学。1915年移居美国后，在密执安大学先后得经济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参加美国农业部工作，于是开始致力于研究俄国农业，这从此就成了他的终身事业。沃林从事这一事业，是具备一些有利条件的，他不但精通俄语，熟悉俄国的文化，在经济学方面又受过西方国家高等学府的训练，而且所掌握的俄国历史知识也一直在不断加深。他对于处在沙皇专制制度和苏维埃专政下的俄国农民倾注着人道主义者的同情，而与此同时却又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学者所应有的客观性。

不消说，这样的条件有助于他一生作出卓越的事业。过了相当时候，沃林当上了农业部下面一个研究东欧农业的单位的负责人，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1965年退休为止。他已被公认为西方国家中研究俄国农业的第一流权威，他在这方面写的或同别人合写的报告、论文和其他著作数以百计，其中有许多作品，包括一份专题研究报告，是由农业部发行的，其他的则刊载在专业性的学术杂志上。如果说，在农业方面俄国现在已远不是丘吉尔所说的那样莫测高深，那么，大部分要归功于拉扎尔·沃林为开辟这个新领域而作出的努力。

沃林撰写本书显然是想把他终身研究思考所得提纲挈领

地统编写出来,结果是一部出色的著作。一位杰出的学者,只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叙述了一百年间俄国农业的历史,从农奴解放前夕讲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从亚历山大二世讲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而且这位杰出的学者是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来如实观察俄国农业问题的,他运用渊博的知识,研究了上自十九世纪民粹主义者的思想,下至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影响下苏联农艺学的不幸遭遇。

当1966年12月6日沃林去世时,他已接近完成本书手稿的最后修订工作,在这之前,这一手稿已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所接受。对这部修订稿,尽可能只作一些出版社通常要做的文字润色和表达方面的校订,虽然偶尔不可避免地要删去一些过时的段落。有几处显然由于疏忽造成了事实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错误,自然也必须加以订正。

没有作者参与其事而要校订一部篇幅如此浩繁的手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乔伊斯·莱博威茨夫人和玛格丽塔·富尔顿夫人在这一工作中运用了高度的技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应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沃林博士从前的同事哈里·沃尔特斯先生审查了本书的校订稿,并对许多难免要遇到的疑问提供了意见,我们也要表示由衷的感激。此外,还承爱德华·基南博士的盛情,从头至尾校对了全书中俄文语词的音译。

沃林博士在作最后这次修订时,显然想把他书中讲到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叙述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为止,但他并不总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正如人们所料到的,这一不足之处在最后几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沃林在别的论著中却曾讲到这几章中所论问题的新近发展情况,希望了解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的读者，可以参阅《苏联和东欧的农业》（杰齐·卡茨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一书中沃林的文章“赫鲁晓夫和苏联农业实况”。沃林博士为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撰写的两篇报告：《苏联的谷物进口》（经研局国外情况报告 135 号，1965 年 9 月）和《苏联和东欧的农业状况》（经研局国外情况报告 151 号，1966 年 3 月），对读者也是有帮助的。

艾布拉姆·伯格森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赫鲁晓夫：农业的领导人和改革者	3
第二章 基本投资和土地	27
第三章 物质刺激和农产品收购	66
第四章 收入和消费品	103
第五章 机械化和电气化	155
第六章 生产的扩大	203
第七章 国营农场	249
第八章 行政控制和计划制订	275
第九章 总结和展望	298
注 释	317

绪 论

苏联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多达五亿四千万英亩以上，人口中约有百分之四十依靠土地为生，因此它仍然是世界主要农业国之一，也是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苏联气候条件不利，尽管它经过了迅速（虽然不太平衡）的工业化，农业却始终保持着这一突出地位。工业的发展当然使农业在全国总产值和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粮食供应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业在苏联经济生活中继续起着一种大得不相称的作用。对俄国人民的生活来说，农业上一个歉收的年成依旧要比诸如钢的生产可能产生的问题更为重要。钢的生产固然影响大炮和导弹，可是，借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大炮和导弹毕竟是不能用来煮汤喝的。

单凭上面这些事实，就已有充分理由对苏联农业政策和农业实践的演变作一全面的分析。但理由还不止这些。英国经济史学家 J·H·克拉彭赞赏地引证古斯塔夫·施莫勒的名言：“从 1500 年到 1850 年，当时欧洲的重大社会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施莫勒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但这句话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仍然是适用的。在施莫勒所说的那段时期之后的一百年中，〔俄国〕农村土地方面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反革命和重大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重大事态发展的进程中，的确，在整个俄国农业结构的形成中，政策曾经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爆炸性的政治、经济问题，这是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俄国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在内）的许多公开言论所证实了的。从始终存在着农业问题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革命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所以，从历史的回顾看来不应只到 1917 年的“分水岭”为止，而是应当利用有关这一专题丰富的俄国文献和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进一步推向革命前的年代，上溯到必要的深度，只有这样，才能对所研究问题的全貌有一个比较正确、比较平衡的看法。

本书前面两个部分就是专门致力于这种历史分析，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间的一百年。最后一个部分试图系统地叙述当代的集体化农业、它的结构以及它是怎样运转的或怎样在运转中出毛病的，如果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来说，即系统地讲述它的机体解剖、它的生理和病理。如果读者的主要兴趣是要较深入地了解当代集体化农业是怎样组织的，是什么东西使它运转的，那么可以直接翻到第三部分。

第一章 赫鲁晓夫：农业的 领导人和改革者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正式宣布了一个“集体领导”新时代的开始和“个人崇拜”（斯大林暴政的委婉说法）的结束。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在权力结构中迅速上升，全国舞台上的集体领导多半成了空话。就农业来说，斯大林以后的头十年从一开始就必须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他还是斯大林的助手时，就已经把农业当作他的特殊领域，后来在公众的心目中，他的名字实际上成了俄国农业的同义语。

赫鲁晓夫很清楚在农业方面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知道俄国人民高涨着的期望是多么迫切，认识到那张过期很久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支票不能再兑现了。在这个问题上进展迟缓，斯大林是可以的，但是对不象他那样强有力的继承者来说就是不行：“对朱庇特大神是合适的事对公牛就是不合适”^{*}。因此，赫鲁晓夫使克里姆林宫承担起认真改进食品供应的责任，有好多次公开许诺要有更丰富、更好的食品。他说，没有食品供应是做不出一碗汤来的，^①他给俄国提出了在六十年代初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和奶类产量甚至赶上美国的美好前景。同时，全国食品需要量还在随人口的增加而增长。过去由于革命、农业集体化、饥荒和战争使人口遭受了巨大损失，又加以国土辽阔，俄国的确还没有感受到许多亚

^{*}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这句话是拉丁谚语。——译者

非国家所苦恼的那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对食品供应的压力。借用丹尼斯·罗伯逊爵士的话来说，“马尔萨斯的魔鬼”对苏联来说还被关着，没有放出来。^②

大战结束以后，人口重又迅速增长，1954年底已稍许超过战前（1940年）的水平，到赫鲁晓夫政权结束时已比战前增加百分之十八左右。从政府的观点来说，更加严重的是城市人口的明显上升趋势，1953年初已经超过1940年百分之二十七，再十年以后，几乎达到了1940年的两倍。当然，城市的食品供应问题总是政府注意的焦点，而城市的迅速发展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困难。事态发展的逻辑要求迅速提高农业产量；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公开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还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在农业政策上作重要的改变。

虽然，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是农业新路线的真正制订者，但宣布斯大林以后时期改革的开始的确是马林科夫和财政部长A·G·兹维列夫。虽然肯定早已在酝酿，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头五个月中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东西讲到即将发生的改变——除非把清算贝利亚（他原先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三大继承人之一）的文告中提到他“对农业方面的一些紧急决策总是百般阻挠”这一句话看作是一个暗示。^③由于贝利亚的追随者已被按照最典型的斯大林方式消灭殆尽，他的这一罪状是真是假，外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后来，在1953年8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在提出年度预算时突然谈到，在向集体农民征收农业税方面要进行的一些改革。^④所征的税收将大大减少，过去积欠的税款将予豁免，税制也将简化。同1921年的情况一样，向全国突然宣布的这一新的农

业税只是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接着是马林科夫来宣布农业方面的一套新的纲领。^⑤他在1953年8月对农业情况进行的分析，远没有八个月以前他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乐观。

当然，马林科夫还得要讲一通集体化农业的成就那套陈词滥调，据他说，“国家的谷物供应是完全有保证的”。他还说棉花、甜菜、肉类和奶类的政府收购量有很大的增加，虽然他没有提供谷物、肉类和奶类的产量数字。但接着他就公开指责了那种根据作物生长情况来估计收获量的做法，这还是这种做法实行二十年以来的第一次。

马林科夫说：“为了更有力地开展运动来尽量减少收获中的损失并增加谷物和其他作物的实际产量，必须废止根据收获前作物生长情况来评价集体农庄在谷物和其他作物生产上的工作质量那种错误做法，而要根据实际产量来评价。不应忘记，只有收割到手、已经入仓的作物而不是还长在田里的作物能使我们的集体农庄富裕起来。”

这样，由于抛弃了按作物生长情况来估产的做法，马林科夫支持了西方对斯大林时期估计收成方法的批评。事实上他是在间接承认苏联过去发表的许多产量数字是夸大的，虽然还要再经过五年，苏联官方才明确证实这一点。马林科夫这一次不寻常地特别尊重“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不专讲“成绩”，也谈到了农业情况的阴暗面，实际上也就拆穿了社会主义农业在飞速发展那个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的神话：

农业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是我们的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关、国营农场和我们的社会制度无可争议的成就。但是如果看不到农业一些重要部门的落后状态，看不到目前农业生产的水平还不能

• • •

与增加的技术设备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潜力相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仍旧有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整个地区，农业处于被忽视的状况；在国内很多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单产和其他作物单产都很低，收割过程中的损失很大；某些集体农庄，由于它们的公共经济薄弱，实物和货币收入仍旧不足，分配给庄员的现金、谷物和其他产品都很少。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对发展畜牧业是不利的，结果我们还远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对肉类、奶类、蛋品和其他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⑥

马林科夫还谈到马铃薯和蔬菜生产方面的落后状态，这不但直接地，而且也由于减少牲畜饲料来源而间接地不利于食品供应。他还承认，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由于我们税收政策上的缺点”而有所衰退，反映在农民收入的下降和私养牲畜特别是奶牛头数的减少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认，因为我们知道苏联这种个人副业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以及城市的食品供应中所起的作用。

马林科夫把农业问题的要害归结为生产不足和农民的积极性不高。还是这个老问题，唯一新鲜的地方是苏联政府坦率地承认了它。马林科夫声称，“紧急的任务是在两三年内迅速增加对人民的食品和工业品的供应。”更为重要的是马林科夫轻轻地点出了过去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农业不能发展的最大原因之一，即苏联对重工业的强调。他回顾了工业发展和投资分配的情况，指出了重工业同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马林科夫尽管一面重申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一面又承认“目前消费品的产量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过去，不可能以发展重工业的同样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

马林科夫说，“在重工业已经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具有了使消费品生产迅速高涨的全部条件。……为了保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以更迅速地提高，今天我们能够，因而也就应该大力促使轻工业尽速增长。”

这样马林科夫在代表斯大林去世后的政府发言中认识到了这一左右为难的处境：追求超级工业化呢还是改善生活水平。他认为，现在是纠正苏联经济中的不平衡状态，在资源分配上作有利于消费者即有利于工农大众的调整的时候了。一个月以后，1953年9月7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时，对这个信息作了远为详细的说明（这个报告于9月15日公开发表）。由于这个文件，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以后制定农业政策的巨匠的身分便确定了。

赫鲁晓夫的农业方针

赫鲁晓夫在指导苏联农业的工作中带来了哪些个人品质和特点呢？可以公平的说，至少在近代，还没有一个统治过俄国的人物象赫鲁晓夫那样熟悉农业，那样对农业感兴趣。从他的家庭背景说起，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农民出身的人。1894年生于俄国中部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童年过的是典型农家孩子的生活，在附近一个庄园里做杂工并当牧童。十五岁的时候显然由于家庭迁移，他到顿涅茨克（顿巴斯）工矿区做工。关于赫鲁晓夫的早期生活虽然很少事实资料，但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他当时过的无疑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困苦生活。肯定要比苏联上层人物中另一个乡下孩子托洛茨基困苦得多。托洛茨基是一个富裕的农业资本家的儿子，